

玉渊杂谭

记得多年前一部青春偶像剧的经典台词——“如果道歉有用,那还要警察干嘛”,这种台湾腔的句式和逻辑虽有些幼稚,但有些时候也能用来形容“道歉多余”。

大概是看到了所谓“伸张正义”的效果,中道协权益保护委员会紧随其后,谴责电影《道士下山》丑化道教,要求导演陈凯歌道歉。

花木兰其人并无正史记载,全因乐府双璧之《木兰辞》的流传而深入人心,走的是文学形象路线,其天然属性就是被改编和演绎。

“君权神授”似的把自己置于文学形象之上,扮演起代言人,垄断其阐释权,这对所有创作者和受众而言都无异于一种精神绑架。

梦龙本意许仙是不接受人妖相恋的,岂能在此误导新时期的青少年?以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和中道协权益保护委员会的逻辑理论,中国文学艺术史就此改写。

如果作品改编本身并未逾越法治和道德标准,只不过令“风雅者”倒了胃口,那么最次称之为“三俗”之作。一个处于开放社会的文明的人或组织,对此可以选择自我抵制,却无要求道歉的权利。

文·杨雪

影像空间

《道士下山》：无处安放的启蒙

文·李宁

围绕着电影《道士下山》的口碑笔伐,如潮起潮落,很快便偃旗息鼓。这是这个时代的好处,凡事都尽可游戏化、熙熙攘攘,热闹一番,便作鸟兽散。

面对众人或辞色俱厉或发科打诨的指摘,这一次陈凯歌表现得心如止水。毕竟,他已经经历过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围攻,那是十年前电影《无极》的上映之时。

在《无极》铩羽而归后,接连创作出《梅兰芳》《赵氏孤儿》《搜索》等影片的凯歌在努力迎合网络时代受众审美的同时,却仍然难以更改其根深蒂固、居高临下的文化精英姿态。

一面是以世俗情色对观众曲意迎合,流露出一股求取媚的味道;一面又以儒道禅语故作清高,彰显出自己的尘外孤标。《道士下山》的精神分裂症病得不轻。不过就算无下限地媚俗,陈凯歌也没有放弃他引以为傲的启蒙者姿态。

似乎陈凯歌仍然没有想清楚一件事情:这已不再是一个需要启蒙的时代了。这是一个大众的时代,一个消费的时代,一个网络的时代,却唯独不是一个启蒙的时代。

然而时移势迁。在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与网络文化合力构筑的文化围城里,启蒙已经成为陈年旧事,被历史的尘埃无情覆盖。越来越低龄化、游戏化的大众文化大行其道,知识分子的犬儒弥漫周遭,时代应有的乌托邦冲动已然退化为重重欲望。

陈凯歌曾形容《道士下山》里的何安下之名意为“不知道该把自己往哪里搁”,这其实是他自己身份与处境的真实写照。他如同一个遗世独立的得道高士,在时代的裹挟下不得不下山入世,却又与时代风格格格不入,落落寡合。

因此,我又深深为陈凯歌的遭际所叹息与感怀。因为,这是一个多么需要启蒙的年代。

因此,吴起这样的高管虽然绩效一流,可是放在企业文化不健全的地方,干工作的弄不过编数字和搞内斗的,为此总是被管理层的其他人排挤掉,还不得善终。

而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看穿了绩效管理的问题,给梁惠王开了一剂药,以“仁”为本,把企业文化搞起来。

这也是孟子见到了梁惠王上的第一堂课,光谈绩效管理不行,得先把企业文化做好。



包容是大众文化时代的关键词

桂下漫笔

爱因斯坦：与北京大学擦肩而过

文·胡一峰



“尊敬的爱因斯坦教授先生:您在日本的旅行及工作在此间受到极大的关注,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您无疑仍然记得我们通过驻柏林的中国公使与您达成的协议。

不过,信中提到“协议”,其实并非正式的讲学合同,不过是蔡元培等对爱因斯坦来华的邀请。说到这段往事,不能不提浙江杭州人夏元瑛。1919年,夏元瑛在老师普朗克引荐下,结识爱因斯坦并随其学习,还经常到爱氏家中求教。

1921年春,也是在夏元瑛的陪同下,赴欧洲考察的蔡元培专程到爱因斯坦家拜访,并向爱氏发出讲学邀请。蔡元培在日记中写道:“午前,夏君浮筠,林君宰平来,同访安斯坦(Einstein),知彼将往美国,为犹太大学筹款。归途到英,荷为短期演讲,即回德。彼现任物理研究所所长,言德人不愿彼久离德。询以是否能往中国,答甚愿,但须稍迟。彼向往中演讲,用何种语言,告以可用德语,由他人翻译,夏君即能译者之一。夏君言:用英语亦可,安斯坦言操英语甚劣。”

又过了一年,爱因斯坦准备到日本讲学,正在德国访问的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得知消息后,马上写信给爱因斯坦,邀其到北大讲学一年。在信中,朱家骅还劝告爱因斯坦先访问中国再访问日本。

所谓日本人的优越条件,主要是丰厚的待遇。在此,我们不得不感叹“有钱才是硬道理”。其实,蔡元培已代表北大承诺北大负责爱因斯坦在北京期间食宿费用,并支付每月一万元的酬金。

薪金约为200元。对爱因斯坦的这一要求,蔡元培颇感为难,幸好与爱因斯坦有一面之缘的梁启超慨然承诺解决部分经费。有了梁启超这句话,蔡元培心中一块石头才算终于落地,赶紧委托中国驻德公使向爱因斯坦发出了肯定答复。

有了这么多的铺垫,按理说一段学术佳话应如约而至了,但遗憾的是,前面提到的中国知识界给爱因斯坦的联名信足足过了半个月才到爱因斯坦手中,而此时的爱因斯坦因久未等到北京的消息,自行取消了讲学计划。

面对对爱因斯坦翘首以待的国人,蔡元培既失望又无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加以解释:“我们合各种学术团体致函欢迎,是表示郑重的意思;一方面候各团体电复,发出稍迟,一方面到日本后因他的行踪无定,寄到稍迟;我们那里会想到他还在日本候我们北京的消息,才定行止呢?”

艺苑

月光下(油画)

肖天平



词说文学史(20)

刘成群

忆秦娥·林逋

霜风咽,西湖一夜梅花发。梅花发,蹊边云鹤,树头明月。

忆秦娥·杨亿

千峰隔,巫阳梦断春云碧。春云碧,一枝芳艳,绿盈回陌。

忆秦娥·晏殊

莺归去,相将还作天涯侣。天涯侣,水昏云淡,帘幕双语。

忆秦娥·张先

花弄影,月来风慢人初定。人初定,徘徊东陌,枝疏云冷。

忆秦娥·柳永

空惆怅,江天暮雨愁何状?愁何状,登楼凝睇,雪涛烟浪。

忆秦娥·范仲淹

聊缓辔,长烟万里残阳坠。残阳坠,胸中兵甲,孤城烽燧。

随想随录

从孟子看梁惠王与绩效管理的失灵

文·姚遥

一代大儒孟子去拜见梁惠王,梁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一句话,格调见高低。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管理着这么大的一个诸侯国的梁惠王,听起来还是个很勤勉的王,见到了高级知识分子,第一句话就问咋能把国家做大做强。

国试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试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这句话放在不打仗的年代,要这样理解,如果上上下下唯利是图,大家好像在搞经营,但其实都要搞内斗去了。



国试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试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这句话放在不打仗的年代,要这样理解,如果上上下下唯利是图,大家好像在搞经营,但其实都要搞内斗去了。

见到知识分子都不寒暄两句,就问怎么可以把业绩搞好,充分体现了一把亲自抓绩效的态度。问贵他下属高管的时候,那就更加开门见山,绝对不拐弯抹角。

在战国时期,市场就那么大,资源就那么多,人力资源也就那么点,技术上还没有许多创新,还要不断地打仗消耗,要把绩效做成稳定增长,困难挺多的。

能如何呢。战国时期的著名高管吴起,用兵如神,治大国如烹小鲜,帮哪个国家就能够把哪个国家给发展的有声有色。

因此,吴起这样的高管虽然绩效一流,可是放在企业文化不健全的地方,干工作的弄不过编数字和搞内斗的,为此总是被管理层的其他人排挤掉,还不得善终。